

民族精神家园:历史的回顾与当代重建

刘学智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民族成员的精神依托和心灵归宿。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过程,认为其始建于殷周,第一次重建于汉代,第二次重建于隋唐,第三次重建于宋明。当前要进行第四次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不能脱离传统儒释道文化这一历史根基,也不能脱离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后在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民众思想观念发生的影响。

关键词:精神家园;儒;佛;道;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2)04-0008-09

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指一个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着的、具有民族精神支撑功能的精神文化系统,它可以成为该民族成员的精神生活依托和心灵归宿。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核心内容有2个:一是精神,二是共有。一个民族之所以能持续发展、经久不衰,肯定内在着一种文化精神支撑着这个民族,它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精神依归;同时,它该是整个民族集体认同的一种精神,这才可能是“共有”。当然,这一精神系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断传承和发展着、在历史上起作用并在今天还活着的民族血脉里,因而可以成为一个民族持久发展的精神生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中华民族广泛认同和尊崇的安身立命、灵魂安顿和精神归依的家园,应该在该民族不断发展着的文化传统中寻找。

在绵延持久的中华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有3个各有源头、各有流变而又相辅相成、相互融通的思想文化系统,这就是儒、道、佛三教,它们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里所说的“儒”,主要是指由孔子创立而在其后不断发展着的儒家文化系统,同时也包括被儒家吸收了的从殷周以来就存在着的宗法、

宗教系统。“道”包括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和后来形成的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佛”是指从印度传入但在此后日渐中国化了的的中国佛教。三教并存,而以儒为主,是西学东渐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在历史上儒、道、佛三教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探讨当代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不能脱离这个根本的文化基础,否则就会走向文化虚无主义,建构精神家园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一、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 始建与历次重建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决不是空白,而是有着深厚的积淀。只是当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精神发展到一定时期,往往因为社会的种种变迁而发生危机,在每次危机之时,总有一些思想的先驱者和勇敢担当者起来挽救其危机,重新担负起重建精神家园的使命。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精神家园总是随着每代人发展着的实践活动而不断地演进;同时,民族精神家园作为一个民族不断流变着的精神文化系统,总是与某一时代的文化思潮相联

收稿日期:2012-10-09

作者简介:刘学智(1947-),男,陕西长安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系,并在该时代显现出其特有的价值。正如梁启超所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1]又说“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1]中国历史上周代礼乐繁盛之时代、汉代儒家经学兴盛之时代、隋唐佛教昌兴之时代、宋明理学高扬之时代,大概都属于其所谓“文化昂进之时代”,同时也是民族精神集中体现之时代。与此相对应,在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精神家园的始建和几次大规模的重建,即始建于殷周,而第一次重建发生在汉代,第二次重建发生在隋唐,第三次重建发生在宋明。与这3次重建相联系,中国古代也形成了3个持久的文化兴盛和相对稳定期。

(一) 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始建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始建于殷周时期,它是古人在与自然界的抗争中、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中逐渐形成的,并通过宗法、宗教的形式而得以建立。人们在大自然的威力与迷茫面前,在与自然界的抗争中,总是感到那么无助和无能为力,于是在人们的观念中逐渐形成了对自然这种超人间力量的崇拜,后来又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天神崇拜。中国人最早形成的“天”,是一个既没有脱离自然界,又赋予其神圣性、义理性的至上概念。人们把它既视为万物的本源,也看作道德的根源。对天的敬畏和依赖,以天为精神生活的依托,是当时人们普遍的价值认同。当人们面对自然的淫威而不能自保时,祭天、禘天,以期得到天的保佑是很朴素而实在的观念“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诗经·周颂》);当人们面对社会生活的痛苦而不能自拔时,人们亦试图借助天来伸张正义,祈求天的恩赐“有命自天”(《诗经·大雅》)、“我受命溥,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诗经·商颂》);天也是历史发展和民意的总根据“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甚至美好道德和良好秩序的形成,也祈盼借助天来得以实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时时可以保护着人们。上层统治者可以借助天来获得统治的权力,下层老百姓也寄希望于天来改善自己的境遇“皇天眷佑有商”(《尚书·太甲中》)、“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尚书·泰誓》)、“慢神虐民,皇天弗保”(《尚书·咸有一德》)。可见,“天”之观念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获得了终极的精神支撑和价值依归,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建构起来的民族精神家园。这一精神家园带有鲜明的宗法、宗教性特点。

与天神崇拜相联系,在殷周时期也形成了祖先崇拜和民族始祖崇拜。此时人们常把自己的精神寄托于自己的祖先,希望得到祖先的保佑和福祉,同时也把自己生活的目标与光耀宗祖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奋斗的动力。当时,“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韩诗外传》卷八)是较为普遍的做法。而“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诗经·国风》),强调遵循社会法度才是对自己祖先的一种交待,也才有资格祭祀祖宗。人们不仅要听训于祖宗“聪听祖考之彝训”(《尚书·酒诰》),而且要对祖宗笃实地尊崇“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尚书·君牙》)。可见,殷周时崇拜祖先、祭祀列祖也是人们的一种精神依托。进而到战国时,形成了关于黄帝、炎帝等“三皇五帝”的民族始祖崇拜,人们将其视为中国人的生命之源和文明之根,加以特别的尊崇和礼拜。尽管黄帝、炎帝这些传说中的人物主要具有象征的意义,但是人们对其作为民族始祖加以崇拜,终于使早先的祖宗崇拜升华为对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这样,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价值的民族精神家园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确立起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承继传统天命观念的同时,也对其做了较大的改造和完善。这主要体现在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建立了一套有鲜明宗法色彩的社会礼法制度,同时给传统的天命观念赋予了一些新的意义。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把天命观与道德、民意联系起来,提出“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观念,又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敬天”、“保民”、“孝祖”成为“礼”的重要内容,并通过一系列庄严的礼仪形式得以强化。总之,以畏天命、重礼乐、讲道德、重民意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成为中华民族最早建构起来的精神文化。这一精神文化系统维持了中国社会稳定达千年之久,并一直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走向。

但是,到了春秋末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其表现首先是传统的天命观受到极大的冲击,怨天、恨天、骂天已

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昊天不佣”、“昊天不惠”(《诗·小雅》)的责骂,使天的至上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亵渎。《周礼》也一再被僭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而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所取代,甚至出现了视礼乐为社会祸害的批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影响中国历史千年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第一次受到冲击。到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使这种冲击更为加剧。先秦诸子们都根据时局和社会变动,在面临精神家园失落的情况下就如何重建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孔子是一位极力主张恢复传统精神家园的学者,他主张通过正《周礼》的“名分”来重建社会宗法秩序,以“尊天”、“畏天”来挽救精神的危机,以“仁爱”、“孝悌”、“忠恕”来加强道德伦理的自觉,试图恢复已经分崩离析的传统精神家园。墨子亦以“天志”的尊天意识来维护传统精神家园,但又以“兼爱”、“尚贤”、“尚同”等学说冲击和修补殷周以来的宗法秩序与伦理道德,并对孔子的儒家学说提出了批评。杨朱以“轻物贵己”的个人本位思想挑战传统的道德价值系统,孟子则又站在孔子的立场上“距杨、墨”,他承继孔子之志,“道性善,称尧舜”,以“仁政”、“性善”等学说力求对孔子仁学强化内在道德自觉的努力向前推进。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说,提出了性恶说,其目的是重建适应新时代的礼法制度。而与孔子大约同时或稍早的老子则要彻底摧毁传统的以礼乐为核心的精神家园,另建一个与传统宗法伦理迥然有异的自然价值系统,并主张以超越性的“道”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终极根据和价值依托。由此他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和法家的法制都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承继老子思想的庄子更以犀利的语言、超然的境界把传统的精神价值系统打得七零八落。此后,秦王朝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但法家只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所需要的武器,并没有建立起为社会所广泛认同的精神系统,法也未能成为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支点。长期以来,学术界多把先秦的百家争鸣视为思想自由、精神解放的盛况而加以褒扬,其实如果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演进的历史

程来看,这并不一定是一个值得称颂的文化现象,故历史上的正统学者对该时期的学术局面多持批评的态度。不过,先秦诸子虽然没有建构起新的民族精神家园,但是其在争论中所创立的思想学说,特别是儒、道诸说,却为新的精神家园的建构做了坚实的铺垫。

(二) 汉代: 第一次精神家园的重建

先秦诸子在激烈论争之后,墨家趋于中绝,名家被肢解,法家在秦遭遇失败,名声扫地。“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书·儒林传序》)。战国末到汉初,凸显出来的基本上是儒道两家。儒家在先秦不仅有孔孟的诸子学,而且有流行已久的“先王之典”即“六经”之学。道家在战国后期演化出黄老之学。汉初高祖时曾有“诸儒始得修其经学”即倡扬儒学的举措,而“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书·儒林传序》)。于是在汉初的统治集团内部曾出现了儒道互黜的局面。这场儒道之争既是统治者关于确立指导思想的争论,若从精神家园的建构来说,也是近百年来在天命神学和宗法伦理崩溃的情况下如何重建新的精神家园的争论。虽然后来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暂时取得了胜利,曾主导汉初思想达70年之久,但是正如《汉书》所说:“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帝纪》卷六)。文景的目的是要民众休养生息,尚无暇顾及精神生活领域的建构。后来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儒林传序》),儒学逐渐成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并同时主导着汉代的学术。不过,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尚不同于作为民族精神家园的儒学,前者与政治密切联系,为政治服务,而后者才可能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但是,儒学借助政治权力的推行,在社会上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逐渐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不仅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也成为民众的精神依归。汉儒虽然也推尊孔孟,事实上却关注更多的是孔子之前的六艺之典,故以先儒经典的研习阐发为旨趣的经学成为主流。《易》之天道观、《春秋》之“大一统”、《礼》之明堂阴阳和伦理规范、《书》之《洪范》五行、《诗》之情志等,都体现了以经学为主导的精神文化系统的特点,即关注“天人相与之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天”为主宰的、以阴阳灾异和阳德阴刑、三纲五常为表现形式的形上精神生

活系统。在这里,殷周以来“天”的观念再次被确立为最高的存在,被视为“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郊语》)、“群物之祖”(《汉书·董仲舒传》),同时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以阴阳五行作为整个宇宙系统论的基本框架和重要内容;把孟子提出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仁义礼智四德进一步系统化、形上化,提出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思想,并以“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卷一二)的天人建构,使殷周以来的敬天、孝祖、爱亲、保民等观念以及君臣、父子、夫妇等上下尊卑的伦理关系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体系,在“天意”论的理论架构下被进一步强化和普遍化。正是经过汉儒的努力,以儒家政治伦理和道德修养论为核心和主导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得以重新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汉代儒学虽被“独尊”,但“百家”之学并未完全被罢黜,先前的道家不仅没有退出,而且仍在流行和传扬。此前有《老子河上公注》、《淮南子》,此后有严遵的《老子指归》和王充的《论衡》,都在阐发老子之自然无为、清虚自守之旨。道家对大道的追求、对自然原则的高扬、对人生命的珍重以及其清静无为的观念、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样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就个体精神而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其得意之时用儒家、失意时用道家的隐逸思想可以成为其精神调适的重要工具,所以全面地看,汉代建构的是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的精神文化系统,二者共同构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三) 隋唐:第二次精神家园的大规模重建

汉代建构的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的精神文化系统,此后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也随之发生了动摇。汉末魏初,儒家经学衰落,儒学逐渐失去了维系社会人心的作用。有所谓“魏晋浮荡,儒教沦歇”(《梁书·儒林传》)、“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晋书·向秀传》)的说法。于是,先是以清谈为特征的玄学流行,玄学虽然旨在调和儒道,但其高扬的实质精神是道家的自然主义。如果说正始玄学还在尽力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建立在道家自然之本的基础上,而竹林玄学则完全是在以道家的自然主义消解儒家一直倡导的伦理道德和礼法系统,嵇康以“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价值取向“轻贱唐尧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正是对儒家正统精神的冲击。这也反映出当

时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人们信仰的缺失。董昭在给魏明帝所疏中陈述汉魏以来“末流之弊”时说:“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三国志·董昭传》)。这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精神失去依托,许多人无所事事的情况。在儒学衰微、玄学流行的同时,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逐渐在中原广泛传播。与此大约同时或稍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产生并日渐发展为比较成熟的宗教。至东晋南北朝时,佛教、道教已可以与儒学相抗衡,且可与之鼎足而立,此后竟形成如宋人张方平所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辅教篇·广原教》)的情况,许多有学养的知识精英遂到佛、道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同时,佛道的价值观也影响到民间,佛教以“四谛”为核心的价值观及其佛陀信仰、净土信仰、弥勒信仰和修行方式等,道教的诸神信仰、人生观念、养生理论、修炼方式等,都迅速地在民间流行传衍。于是,逐渐形成了儒、道、佛三教并存鼎立的思想文化格局。

隋唐时期统治者没有回避佛、道与儒学并存的事实,而是自觉地顺应了这种趋势,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方针,即以儒、道、佛三教为根基,来建构民族的精神家园。他们一面提倡佛教,“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2]。唐太宗虽然认为佛教是“弊俗之虚术”而“非意所遵”,但仍认为它乃“有国之常经”(《旧唐书·萧瑀传》),原因在于佛教可以“灭怨障之心”(《唐太宗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载《广弘明集》卷二八)。承魏晋发展之势,佛教在唐初的传播已势不可挡,不仅庙宇林立、僧尼剧增,而且宗派众多,思想活跃。于是,佛教终以其精深的理论、超然的人生态度和其所渲染的天国净土,既吸引着社会的士大夫和精英人士,也征服了广大的普通民众,成为影响唐代思想文化的主导性思潮;同时,隋唐统治者也推崇道教。唐高祖于武德八年提出“老先、次孔、末后释宗”(《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之序,道教被列为三教之先。唐太宗亦说:“朕之本系,出于柱史”(《令道士在僧前诏》,载《全唐文》卷六)，“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道教承魏晋发展之势,随着唐室将其与自己的祖宗挂搭起来,道教遂被抬高到国教的地位。这样,道教的大道精神、自然境界、养生理论、诸神信仰和追求精神自由超脱的人生理想等,不仅影响到知识层,而且在社会民众中有着深厚的根基。而此时的儒学,其景况虽然大不如前,但是,由于统治者依然清醒地认识到其无法替代的治国功能而仍受到

特别的尊崇。唐太宗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慎所好》),故仍以儒学为治国之本。开国伊始,太宗即令颜师古编写《五经定本》。又命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于是,南北朝时曾一度分立的经学逐渐得以统一。隋唐儒学虽然仍沿袭着汉魏经学,继续其训诂的路向,且墨守师说,但仍开创了以“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使汉代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儒学,开始向穷理尽性的儒学转变。中唐后《孟子》、《大学》、《中庸》等地位的提升,就是这种转变的表现。韩愈提出儒家的“道统”说,勾勒出儒家思想的主流是仁义之道,而且把孟子提高到仅次于孔子的地位。李翱发挥了《中庸》的“性命”说,将其与《孟子》的性善说、佛教心性说结合起来,使儒学重新向孟子的心性论回归。可以说,韩、李开宋代理学以孔孟心性儒学为主导之先河。隋唐统治者采取的三教共宣的方针和扶植佛道二教的宗教政策,在唐代总体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就一般的意义上说,三教各有其特点,且在终极追求的设定上,三教都力求保持自身的纯粹性,保持自身安身立命的价值根据。但是,儒家对伦理价值的重视、礼仪规范的强调和心性修养的观照,与道家 and 道教对自然、自由境界的向往和生命价值的珍重以及修炼方法的探寻佛家对超越心灵境界的构筑和心性修养的强调,又可以使之并行不悖、相互吸收、相互融通,于是三教共同构成了该时期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样,汉代以来的儒术独尊和儒道互补的局面被打破,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出现多元化的倾向,即由原先的儒道互补延展为儒、道、佛三教的并存和鼎立。与上一次精神家园重建的情况有所不同,前次重建是发生在已有的精神文化系统发生危机或崩衰之时,而隋唐时期的文化重建,则是在汉魏以来已形成的三教并存格局基础上的丰富、延展性的重建。总之,三教并存,以佛为主,是唐代精神文化体系的基本格局,也是隋唐时代民族精神家园的基本特征。

(四) 宋明: 第三次儒、道、佛精神家园的大规模重建

晋唐以来儒、道、佛三教并存的格局,到唐末五代时没有大的变化。不过,此时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即持守儒家正统观念的学者就汉唐以来佛、道对儒学阵地的侵淫、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毒害”极为不满,也对汉代以来的儒学“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宋史·张载传》)

的境界不满,主张在反思晋唐以来佛道风行之弊、反思汉代以来的儒家经学之弊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唐思想文化,重振精神,重建孔曾思孟的儒学系统,这是宋初以降诸多学者的强烈愿望和普遍取向。尽管儒家学者们对佛道持激烈批判态度,但是无法改变晋唐以来三教并存和相互融合、三教合一的大势,甚至批判者自己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佛道的思想来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宋初“三先生”以及北宋张载、二程等都曾出入过佛道而后归之于儒,其反佛道而崇儒学的态度和理论建设,都对在儒学基础上重建新的价值系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一面批判佛道,一面吸收佛道的本体论和心性论建构其理学的体系,所以,理学实际上是晋唐以来三教融通、三教合一的产物。但是,该时期“三教合一”的理论成果,不仅有儒学形态的理学,还有佛教形态的禅宗和道教形态的全真教。禅宗是站在佛教立场上吸收儒学的伦理观和心性论、道家和道教的本体论和修养方法而形成的具有典型中国化特征的佛教。全真道本身就以“三教合一”为旗帜和价值取向,是既吸收了儒家的伦理观、佛教的心性论和修行方法而又保持了道教主要特征的新道教。可以说,宋明时期形成的民族精神家园基本上是在“三教合一”的思想基础上建构的。这一精神系统的特点在于,既有精神生活的多元取向,又有相通或趋同的价值追求,这集中表现在:一是都尊崇儒家的圣人孔子、孟子;二是都认同“三纲五常”为基本的政治伦理原则;三是在本体论上相互融摄,三教中儒家的“理”(天)、道家或道教的“道”、佛教的“理法界”与“佛性”往往相互融通,如《性命圭旨》所说“教虽分三,其道一也”(《人道说》卷一);四是在修养方法上三者趋同。三教都趋同于心性修养,皆主张明心见性。正如《性命圭旨》所说“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练性’,释曰‘明心见性’。心性者,本体也。”可见,此时的民族精神正是建立在三教相通的基点上。此次精神家园的重建,不同于前两次的特点在于,它是在对先秦以来整个精神文化系统做出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重建,儒学力批佛道而归于儒,力图重建孔孟的传统;佛教反思儒、道而重建新的佛学系统;道教则全面审视三教,最终选择了在“三教合一”的基础上高扬道、归于道。不过,三教之中,以儒学形态出现的理学成为该时期主导的精神价值体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三教并存,以儒为主,是宋明时期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

这一在“三教合一”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精神生

活体系,影响中华民族长达千年之久。以儒为主的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自强不息的精神、民族自强自立的意识、爱国精神、民族气节、社会担当意识、维护伦理秩序的意识、个体道德自觉的精神、追求仁义等社会正义原则的精神。正是在这些民族精神的感召下,才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尽管从明末以至清代在民间分化出许多民间宗教,如黄天教、罗教等,其或者扬佛,或者倡道,或者外佛内道,或者外道内佛,但是在思想上基本都呈现出“三教合一”的特征,而儒学则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就是中国在清末以前精神生活领域的基本格局。

二、近百年来民族精神家园的失落与起伏

历史的车轮走到清末。清代仍沿续先前以儒为主、佛道为辅、三教并存的思想文化格局,只是此时因政治上的文字狱和民族高压政策,使得许多社会精英钻进了故纸堆,走向了考据学,儒家的传统精神不为人们所关注。而佛道二教又多分化且日渐出现世俗化、民间化的趋势,涌现出众多的民族宗教,于是社会思想陷于杂乱和多元的局面。不过,程朱理学所高扬的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仍在社会上广泛发生着作用,但是由于其愈来愈僵化和教条化,从而大大束缚了人的自由,压抑了人性,成为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惰性力量。加之此时西方列强入侵及其进行的文化渗透,已对传统精神构成了严重的冲击,中华民族再次失去了凝聚力、创造力和前进的活力,人们再次失去了精神的家园。辛亥革命正是在中华民族面临极大危难时发生的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政治革命,对辛亥革命志士们的努力不能低估。但是,辛亥革命只赶走了一个皇帝,旧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此后,中国社会陷入多年的动乱。于是,在那时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又一次在寻求和建构适应该时代的精神家园,“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于是掀起了一场旨在清除理学末流之积弊的反传统运动。对这场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也不能低估,它至少使中国人重新觉醒,认识到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国民的劣根性,从而打开了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的大门。但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乃至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基,而西方的各种思想流派遂乘虚而入,

纷纷登场,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进化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回归传统,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建构新文化;全盘西化论者主张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改造中国社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较量,最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民族独立,同时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民主政权,并且经过曲折的努力,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应该承认,由马克思主义所唤起的革命热情和共产主义理想,曾经使一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人自信地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建国前后的几十年间,它确实成为凝聚中华儿女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精神支柱。但是,多年来所形成的一套“左”的思维方式,没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结合,所以没有及时地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意识。后来发生了一场旨在“与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史无前例的“文革”,社会主义事业严重受挫,于是脱离中国传统而建立起来的那套精神文化系统和信仰体系,渐渐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遂导致中国人现在这种心灵飘荡、无处依归的文化“无根”现象,人们的精神成了“无根”的“游魂”。

同时,在人类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危机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也越来越被工具化;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许多人也越来越为功利性所驱使,追求财富的贪婪使相当一些人失去了自我;即使处于象牙塔的知识精英们也有不少人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实用主义、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思潮弥漫,昔日被视为引领社会文明殿堂的大学,今天几成社会的缩影,时不时飘荡着、思想迷茫、学风浮躁、精神抑郁的阴霾,表现出精神家园丧失后的困惑、烦躁和不安。社会上还有更多的人明显表现出人文精神失落后的焦虑和空虚。总之,传统断裂和现代性冲击所导致的精神危机,已经表明中华民族面临着第四次精神家园重建的艰巨任务!

三、历史的任务:第四次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建

相对于前3次精神家园的重建来说,当前的重

建任务更为艰巨。汉代的重建,有着“先王之典”和先秦诸子的坚实精神文化基础,是一种选择、发展性重建;隋唐的重建是在魏晋以来三教并存基础上的延展性重建;宋明的重建是在三教融合的广阔文化背景下的反思性重建,而第四次重建则是在失去传统文化根基、传统与现代断裂、民族文化认同感降低、现代化强烈冲击而思想文化多元并存、社会信仰体系危机背景下的重建。因此,今天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建,其任务更为复杂和艰巨。

第四次重建的首要前提是,要增强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的毁灭,就是民族文化的毁灭;反之,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延展。如果否定传统、割断历史,搞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就会丧失民族之本,失去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支撑点,这样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也就会失去根基。同时,如果关起门来一味欣赏自己的传统,而不顾及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这个精神家园也是建立不起来的。也就是说,认同民族传统文化与正视世界文化的发展是不能分割的。因为今天的中国不同于过去的中国,今天的文化也不同于历史的文化。当代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地球村”的出现,使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孤立地存在、谋发展。精神生活领域也同样,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也不能脱离世界精神文化发展的方向,所以第四次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必须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世界当代优秀精神文化的认同结合起来。

不过,精神家园的建构固然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联系,但是二者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文化发展可以吸收世界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但是精神家园只能是民族的。即使是西方的优秀文化也只有在其被中国化的前提下才能成为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元素”。也就是说,今天建构民族精神家园,只能以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

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分并使之中国化,从而建设适应新时代、具有现代性的民族精神家园。

以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这个根基不能脱离历史上的儒、道、佛三教。把三教之中仍有价值的部分与今天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相结合,以此建构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正是我们可能的选项。从历史上看,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且为历代儒道诸家所认同,而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在宋明三教合一背景下也为各教所普遍认同,所以,黄帝、孔子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象征。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超越了时空,一直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发展,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儒家的畏天敬祖观念、仁爱思想、恕道原则、和谐人际关系的人伦规范、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社会担当意识、“义以为上”、利他主义的正义原则和行为准则、“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德修养原则和人格境界及“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等等,曾经培育、造就、鞭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有的以此激励自己,锐意进取,光宗耀祖,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息;有的以此安身立命,使自己的身心得以安顿;有的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生存心安理得;有的以此教育子女,将美好的希望寄予未来,以此使自己的心灵得以慰藉……。孔子所追求的精神生活就这样一直涌动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其精神生命也就这样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合而为一,从而使中华民族精神绵延不绝,以独特的文化精神立于世界之林。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历史上社会动乱时有出现,改朝换代屡次发生,但是我们的民族没有瓦解,我们的文化没有中断,即使在国家分裂的时期,我们的文化精神也依然持续,人们仍然守望和不断重建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儒家文化精神对凝聚中华民族、激活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活力所起的历史作用,绝不是某些文化虚无主义者的几句口号或信口开河地谩骂所能抹杀得了的。

佛教在历史上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已经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中国佛教把印度佛教为人们创设的彼岸净土转化为现世日用伦常中的此岸理想,以“我心即佛”、“自性是佛”、“世间法即出世间法”的不二法门,把

人们的理想从遥远的天国拉向现实的生活,将其引向在现实中通过“明心见性”把握自我从而获得精神解脱的成佛之路。在这里,佛是人们灵魂依托的彼岸之善,也是人们理想的精神家园。而彼岸即此岸,“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烦恼即菩提”,这与儒家强调的在现实中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的路向趋于一致。虽然佛教在明清以降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但是其对彼岸世界的敬畏之心并没有减弱,只是更突出人的自我觉悟,凸显人的主体性。人们可以通过“自悟”、“自觉”来化解心中的郁闷,忏悔自身的过失,以求得心灵的解脱和精神的慰藉。因此,佛教以其中国所特有的宗教性,即使在今天也可以成为某些特殊群体人们的精神家园。

道家本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家还是中国哲学的主干。道家的核心精神是“道”,此道不仅是宇宙的本源,更是人的生存本体和心灵境界。人的生活离开了大道,就会失去根基,就会走偏方向,故“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道”的内在精神是“法自然”,是“守朴”,是离开人为雕琢的本真之状。人只要保持此道的状态和境界,就会永葆本真的天性而不失,从而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道家的大道追求是出于生命本真的追求,故“得道”、“与道为一”一直是中国人身心修养的精神方向,可见道家之“道”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道家后来演化为道教,道遂具有了神圣性、宗教性。但即使在作为宗教的道那里仍不失其人文的意义。只是它通过诸神的信仰,被提升为最高的神灵。道教以其宗教性把道的功能加以夸大,同时也把其理论加以放大,不过正是通过这种放大,其包含的养生理论、静修理论以及对道的敬畏,前所未有地在民间得以普及,深入广大民众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因此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3]这里鲁迅虽然并非是从褒扬的意义上说的,但道出了一个历史的事实。

在今天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重建精神家园之时,不能忽视传统的儒、道、佛在构建精神家园中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以儒为主,佛道为辅,应是我们今天构建精神家园建设的历史文化基础。不过,说以此为基础,不是说要搞文化复古主义,而是在这一文化土壤之上,借鉴和吸收包括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使之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即使是

西方的优秀文化如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在中国化之后才能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元素”,正如历史上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只有在中国化之后才逐渐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可能以别的民族文化作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

通常所说的“中、西、马”,其实仍是中西文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只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一般的西方文化,它是借鉴、吸收和总结了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而形成的最科学、最能反映人类社会规律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就不断地实现着它的中国化即与中国社会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以其中国化的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家园,并不断融入和指导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家园的建构。需要区别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今最为科学的社会理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改造的武器。但共产主义既是运动,也是特定群体即共产党人的信仰。如果要以此作为全民族的信仰,可能不是抬高而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同时也是不切实际的。

四、结 语

总之,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经历了多次失落与重建的曲折历程。当前要进行的第四次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不能脱离近千年来精神文化体系变化的实际,既不能脱离传统的儒、道、佛文化这一历史根基,也不能脱离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后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民众思想观念发生的影响。因此,既要发掘民族文化的深厚历史资源,也要注意发掘民族文化鲜活的当代资源,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当代民族精神家园建构的基础和出路。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 [2] 宋敏求. 长安志[M].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
- [3] 鲁迅. 鲁迅全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National spiritual home: its historical retrospect and current reconstruction

LIU Xue-zh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Xi'an 710062 , Shaanxi ,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spiritual home is the repose and homeland for the soul. Constructing process of Chinese national spiritual home was reviewed in this paper. It is believed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ual home originated from Yin and Zhou Dynasties , its first reconstruction was in Han Dynasty , the second wa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 third was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Currently , the fourth reconstruction is under way and this reconstruction can't break away from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 Buddhism and Taoism , and can't ignore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ulture on Chinese society , especially on Chinese ideology and outlook.

Key words: spiritual home;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western culture

.....
(上接第 7 页)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QU Lin-dong

(School of History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culture is dialectical: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connotation, history is a part of culture; in terms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its reflected outlook, culture is included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y plays an unique positive role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t can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ntinuous cultural development, reveal the fine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different nations in history,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ise and fall, order and disorder, and spread historical knowledge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quality.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can enhance Chinese history to a higher level, and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progress of Marxism history and establishment of inheritance system and the growth and expanding of historians, so as to usher in the new height and realm of Chinese histo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histo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dialectical relation; historian